



天朝的狂欢

义和团运动兴衰史

TIANYAO DE KUANGLAN
YIHE TUANTUONGONGXINGSHI

鹤阑珊 著

GU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天朝的狂歌

义和团运动兴衰史

TIANCHAO DE KUANGHUAN
YIHE TUAN YUNDONG XINGSHUAI SHI

鹤阑珊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朝的狂欢：义和团运动兴衰史 / 鹤阑珊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495-0099-4

I. 天… II. 鹤… III. 义和团运动—历史—
通俗读物 IV. K256.7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956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芦城工业开发区创新路 101 号 邮政编码：100071)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12.5 字数：230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册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楔子 / 001

一 大刀愤怒 / 004

大刀会与教会的冲突绝不是正邪不两立,而是一山不能容二虎。一山之所以不能容二虎,也并非两只老虎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只是因为老虎下面的狐狸或是狼靠着老虎的威名,不肯跟对方打好关系。小弟受了伤害,做大哥的如果不出面,显然不符道义。于是,一山中的两只老虎自然会碰面,开战就是必然的了。

二 助清灭洋 / 024

赵三多为了尽最大努力避开官府追讨自己的责任,树立了一面大旗:助清灭洋。这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它在后来的义和团运动中始终是口号和宗旨。可谁又能想到,这不过是赵三多为了逃避官府的一个计策。应该说,“助清灭洋”是个伟大的发明,他避开官府直接向洋人开战。一方面说明了洋人的可恶,另一方面则说明了官府在洋人面前的无能。

三 降神附体 / 042

对于教会和官府来讲,这俨然是个危险信号。但无论是教会还是官府,都无法控制住神拳的迅猛发展。官方报告说,神拳所以能比大刀会和梅花拳发展的速度快,就是因为神拳的师傅在降神附体时可以让人来看,围观的人越多,降神附体的速度越快。拳师的表演如果不是很蹩脚,就能引起所有人的好奇心。而最为重要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降神附体,不分贵贱,不分老幼。

四 朝堂情绪 / 056

一个被彻底铲除自尊心的人往往会选择逃避一切,渐渐发展下去,便会痛恨一切。一个国家同样如此。自1840年以来在与外国人的战争交流中总处下风的大清政府由洋务运动的崇洋渐渐地转变成了仇洋心态。第二次鸦片战争过后,就有一位皇室成员声称要对洋人

采取强硬态势，并煞有介事地拿出了一份对付洋人的方案。确切地说，虽然朝廷有一批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方法来避免与洋人的直接冲突，并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收效甚微。他们所担心的天朝情绪问题最终在即将到来的20世纪还是没有悬念地发生了。

五 拳民进城 / 075

“涿水事件”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自清政府下达剿拳行动以来，高级军官在战斗中丧命这还是第一次，清政府大为吃惊。让他们尤为重视的是，直隶拳民已经公开反叛，完全没有把政府放在眼里。还让朝廷震惊的是，在此之前的义和团即使和官军有所对抗，也只是松散的群体对抗。而这一次，义和团显然具备了一个组织应该具备的严密性，他们学会了调兵、埋伏等战术。

六 大国将战 / 103

一个国家在对外宣战前，总要三思而后行。不过，一旦有突发事件，即时的冲动就代替了冷静的思考。清政府得到一位叫西摩的指挥官将带军队来北京的消息后，就完全丧失了冷静思考的能力。慈禧召集所有在京的高级官员出席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御前会议，让官员们讨论该如何对付即将到来的西摩联军。不过，慈禧太后刚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在一旁脸色相当差的光绪皇帝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勇气，突然也抛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最敏感的问题——京城义和团的生死问题。

七 奉旨灭洋 / 132

其实，在当时的义和团看来，北堂的战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冲突。从根本意义上讲，它是一场比试法术的竞赛，是作为义和团的神与他们心中的“洋鬼子”进行的一场法术大比拼。义和团就是要和洋人、教民比试一下谁的神法力更大，能占得上风。所以，当义和团遭受挫折时，总是把失败原因归于对方更有效力的法术，而不归于对方的先进武器。

八 最终归宿 / 174

慈禧太后在西逃中，首先是为了取悦联军，其次是恨透辜负了她的义和团，遂下令整个帝国的军队都可以向义和团动用武力。义和团成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人了。他们不但要面对政府军的频繁攻击，还要面对教会势力的反扑。义和团运动是否也是清政府的劫难？而当他们完成自己的使命后，也会被他们所信奉的主人——太上老君或者是某个响当当的神仙收回？

附：义和拳事件大事记 / 195

楔 子

光绪二十六年(1901)最后一天的晚上,兰州总督府内,三位政府官员正在吃年夜饭。这三人中一位是署理陕甘总督李廷箫,另一位是甘肃按察使何福堃,还有一位是刚成为草民的前任山西巡抚毓贤。

几个月前,联军应清政府宣战而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逃至西安。双方很快达成和议,条款之一是惩治一批大清政府高官,毓贤就是其中一位。他所受到的惩罚是暂时革职充军新疆,但洋人并没有答应这种惩罚。兰州是从东南一带赴新疆的必经要道,清代流戍新疆的罪臣大都取道兰州西行。所以,毓贤此时才有机会坐在兰州的总督府内吃他的年夜饭。

夜凉如水,如毓贤的心情一样。三人正吃时,忽然一封上谕发到总督府,声称:“已革巡抚毓贤,曾在山东巡抚任内妄言‘拳匪’邪术,至今为之揄扬,以致诸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内,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着传旨即行正法,并派按察使何福堃监视行刑。”

上谕中的指控,句句属实。毓贤听完后,微微一笑,向宣读的李廷箫请求,请假以时日,料理后事。李廷箫与何福堃很好讲话,三人就约定于辛丑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月初六行刑。

大年初一,李廷箫突然自杀,原因是毓贤任山西巡抚时,他为按察使,也积极参与了诛杀教士事件。

大年初二,毓贤赶到李家吊丧,仰天大笑道:“我死,分也,君胡为先我而死?请小待,当聚谈于重泉之下。”

大年初三,毓贤到照相馆拍下最后一张照片,同日,为自己及妻妾购回了三具棺材。

大年初四，兰州绅民听到毓贤将要被正法的消息，纷纷上书，请在西安的两宫收回成命。并于满城四关张贴匿名告白。毓贤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笑，随即写成一张答复，也可算是对自己一生所做之事无悔的独白：

贵省仁人君子通知之。尝闻君子爱人以德，成人以美。贤获罪朝廷，死固宜也，既无所悔，又无所惧，身为大臣，理当奉法。顷闻有人在本城各处张贴告白，约会大众，代贤请命。此事万不可行。贤在山西巡抚任内办理教案，未能庇护彼族，实有办理不善之咎。前者朝廷谪贤荷戈出塞，洵属格外保全。奈彼族要挟不已，必欲杀贤而甘心。今者置贤于法，非出朝廷本意，实有万不获已之苦衷，贤所仰体而默喻者也，以故死而无怨。且琴操有言：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尔等读书人谅必知之。俗谚亦曰：君教臣死，不敢不死。尔听书看戏者亦必知之。若如公等率行妄请，不惟无济于事，朝廷必加贤沽名钓誉、不遵典刑之罪。公等思之，是爱贤乎？抑害贤乎？且纠集千万人，品类不齐，保无哥会匪徒混迹其中，乘机滋事。此又贤为贵省过虑者也。务祈速作罢论，使贤光明正大，守法以死，是为至感、至幸。如不听鄙言，贤惟有刻速自请执法者行刑。是大众速贤之死也。大众之心安否乎？区区微忱惟谅之。

何福堃得知这一事件后，立即决定初四夜半行刑。毓贤并不知道行刑改期，但还是提前留下了挽联两副：

其一：

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
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二宫心。

其二：

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女七龄，髦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

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生叹有负圣明。

大年初四夜，毓贤的大门被敲开，来人道：“我是督标参将，有公事面商。”

毓贤一笑：“你们将要杀人吧？请少待片刻。”整理衣冠，并看着自己的妻妾自杀后，走出来，问：刑场在哪里？参将告诉了他。

毓贤信步抵门口，表情平静，整理衣冠，朝北方九叩首谢恩后，对仆人说：“腊月里，某人送纸求书法，我已应允，不能言而无信。”仆人大哭，哭声中，毓贤的脑袋已经落地，一魂归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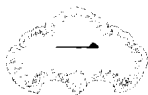
毓贤在路上并不孤独。

早在两个月前，同样是朝廷高官的大学士刚毅死掉。毓贤被杀的前一天，正月初三，皇室载勋被逼自尽于蒲州。毓贤死的两天后，正月初六，大臣英年、赵舒翹被赐自尽。正月初八，大臣启秀、徐承煜被下旨诛杀。1901年的春节，对大清政府许多高级官员而言，是个催命的节日。

表面上，导致他们魂归西天的是正在北京准备与清政府谈判的联军，但归根结底，是一场运动夺去了他们的生命。这场运动就是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在山东与直隶，却影响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上述被杀的高级官员虽然职务不同，学识不一，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他们都是这场运动的坚决拥护者。而最终，他们的生命也随着这场运动的失败而终结。

那么，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地方注定了他们的悲剧结局呢？

大概是山东曹州，我们的故事最应该从这里开始。



大刀愤怒

官府的不作为与土匪的无所不为是刘士端在山东曹州曹县创建大刀会的最根本原因。

曹州在地理分布上属于鲁西南地区，这是四省（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搭界之处，但凡是在这里为官的地方官都被似乎永不消失的匪患骚扰得寝食难安。他们最应该痛恨的是从此地经过的黄河。黄河虽然也给当地灌溉带来了方便，但它在鲁西南创造的“最大成就”却是周期性的洪水泛滥。特别是 19 世纪末期，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几乎每年都要来一次。百姓无法耕种被黄河水浸泡的土地，但政府却没有落下收税的使命，为了生存，许多百姓只好去当了土匪。

另外，鲁西南还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长期以来，该地习武练拳之风颇为兴盛，当地人充满热血，好勇斗狠，“梁山好汉”、“山东响马”的传说一直影响着他们。多年以前，太平军余部和捻军又在此地长期流窜，引起一批热血青年竞相模仿，这些青年最终成为“问题青年”，步了“梁山好汉”的后尘。等于说，有人是被迫当了土匪，而有人却是心甘情愿地把土匪当成了一种职业。

地方官也为这种匪患“开绿灯”。由于地处四省搭界，四省的地方官经常将该是自己的责任推诿于他人，而被责任推到的地方官又继续推，谁也不肯将关于土匪的案子归到自己的名下，此地遂成为“四不管”之地。

盗匪在鲁西南的猖獗，曹州可作为典型。每一届在曹州的地方官都对此地咬牙切齿，他们强烈谴责曹州是盗贼的家乡。这种情况在 1894 年甲午战争后更为严重。为了支付甲午战争赔款，清政府加重盘剥，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交给了土匪，

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在匪患严重之时,一些村民指出,出去转一圈,就可能被土匪抢;若是去离家门很远的茅房,必须要两个人才行。还有激动的村民抱怨说自己是不是掉进了土匪窝。

作为地方势力的唯一有权威性的官府,并非不想出力来治理匪患。任何一个官员,无论是好官或是狗官,对骚扰百姓的人绝不会手软。百姓是他的生命线,他需要靠这条生命线来为朝廷交纳税收,来为自己中饱私囊。一旦生命线被破坏,官员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官府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尤其是甲午战争爆发后,曹州地方驻军被抽调到前线防御日军,使得原本统治就薄弱的曹州地区更加失去控制。有材料表明,这个时候的土匪常常在光天化日之下,手持洋枪,进入各家抢劫,如同进自己家一样,阻止这一行为的人立即被枪杀。甲午战争结束后,为节省财政开支,清政府又多次遣散兵勇,不但使地方维持治安的力量严重削弱,而且这些当兵多年、受过正规训练的兵勇为了生存,许多人也成为为霸一方的土匪,给社会控制带来更大的麻烦。

官府解决这一麻烦的手法从之前的派军队进而依靠地方团练。此举也不是很理想,团练长时间不能从政府那里领到工资,许多人早已经不干了,少数团练虽然还存在,但谁也说服不了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去跟土匪理会。官府无能为力,百姓指望地方官府来保护自己的幻想逐渐破灭。

必须要有一种势力来保护百姓,以代替官府的不能作为。曹县烧饼刘庄的刘士端适时站了出来。

刘士端是烧饼刘庄的小地主,年轻时热衷功名,功名却不喜欢他,不过他还是捐了个监生。大概在19世纪80年代初,一位白莲教徒被官府通缉而跑到了烧饼刘庄。这位教徒姓赵,传言用刀枪在全身各处用力砍刺而毫发无损。刘士端知道这种功夫叫金钟罩,通俗来说就是刀枪不入。他小时候就练过,但没有成功。在赵师傅的指导下,刘士端是否练成,史无记载。不过,赵师傅从烧饼刘庄走后,刘士端就以“刀枪不入”为口号开始招收学徒。

至于大家学“刀枪不入”的目的,无非是解决现实问题。现实就是,当地的土匪数量极多,许多村民都曾受到这些人的骚扰。倘若练成了“刀枪不入”,有神功护体,土匪的武器自然就成了废物。

一开始的招生工作并不顺利,显然,刘士端忽略了几个问题。首先,在那个时代,公开练拳的拳会组织很多,但官府控制很严。官府对拳会与秘密宗教结社的衡量指标不是很明确。自清中叶以来,官府对反清的秘密宗教结社和一些武林高手开办的以学武健身为目的的拳会都是不支持态度。但时过境迁,清政府发现,一些

或明或暗的拳会并不具有反清思想，又加上中外矛盾的日益加重，政府已经没有精力对民间的拳会进行有力度的干涉了。可政府不认可的态度始终让普通百姓一遇到拳会便退避三舍，三思而后行。其次，刘士端以“保卫身家”四个字为招生广告的主标题，显然就压缩了生源。“身家”所以要保，前提是要有。曹县烧饼刘庄富户不多，有土地的人也不多，大多数是些无“身家”可保的人。最后，他招生广告的副标题“刀枪不入”并不能让人信服。关于刘士端的材料中，没有记载他真的就练成了这种神功。在后来一些土匪嘲笑大刀会的“刀枪不入”是扯淡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刘士端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并不具备这样的特异能力。

天下万事如同三尺之冰，必有破的那一天。刘士端的招生事宜渐渐有了转机。转机的出现要归功于刘士端的能动性和土匪的越发猖獗。

刘士端虽然只是个小地主，但他本人却是烧饼刘庄刘氏望族的族长。长期以来，刘士端靠着施舍与为民解惑获得了一个乐善好施的美名。品德作为一种影响力，在此时开始起作用。他亲自登门拜访当地的地主和一些富农，以利害晓谕众人，最后正告大家，官府无论如何是靠不住了，要靠只能靠我们大家联合在一起，共同对付土匪。同时，他还进一步去游说当地的乡绅，让他们组织的团练成员也来练刀枪不入。

这种游说活动并不限于曹县，附近的单县，包括安徽、河南、江苏等地邻近县城里的人，都是他公关的对象。除了在嘴巴上卖力外，在行动上，他更是不遗余力。他亲自带领全部大刀会成员（十几人）与一股土匪进行了一场恶战，这次战斗以土匪被击败，大刀会无一人伤亡而结束。人们开始相信他和他的刀枪不入，相比之下，相信刀枪不入的人更多一些。

1895年春天，刘士端的大刀会会员已经发展到上万人，曹州之外，兖州、青州，河南开封、归德，直隶大名、保定，安徽泗州，江苏徐州一带都出现了大刀会的门徒。或许就在这个时候，刘士端才正式将自己的组织定名为大刀会。至于这个名字的来历，众说纷纭。有人说，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有了这个名字，还有人说，大刀会就是金钟罩，脱胎于白莲教。刘士端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组织定名为“大刀会”，已不得而知。或许他是图方便，看着门徒手中的大刀，随即就定了下来；又或许是，他从之前的拳会名号中随便抽了一个，而这个名字恰好就是大刀会。

不过，让人没有怀疑余地的是，刘士端的大刀会并不同于其他拳会那样只是单纯的练拳，他的目的是保卫身家，理会土匪。他的大刀会也不同于民间秘密结社，因为他没有反清思想。

其实完全可以说，刘士端的大刀会就是一个新成立、带有新思想、指向新方向

的民间组织。官府作为平衡当地秩序的一种影响力失去后，必须要有一种影响力来代替它，而这个影响力就是大刀会。

大刀会并非什么人都收，他设置的人会门槛中“自己购买武器”一项就能让一些穷人望而却步，更何况每天都要拿出十文烧香钱的规定了。这或许就是大刀会要跟土匪纠缠的原因，因为所有成员都是希望可以练成刀枪不入的有身家可保的人。

刘士端开始实现他的主张，跟土匪开战，并由最开始对土匪的防御转入了正式进攻。政府方面并没有出面阻止，这当然要归功于刘士端的活动能力，他不但与地方士绅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而且还和官府打上了交道，使其默许了刘士端对土匪的进攻行为。

就在1895年春暖花开之时，刘士端带领他的大刀会已经帮助无数百姓击退了土匪的骚扰，而且还将当时土匪中的“佼佼者”岳二米子杀掉了。正是这场胜利，使其获得了朝廷赏赐的二品顶戴头衔。在当地百姓心目中，大刀会隐约地代替了官府行使本该行使的职责，它成为百姓心目中的一盏阿拉丁神灯，刘士端已经成为救苦救难的菩萨的象征。

事业发展得相当顺利，刘士端几乎可以从官府那里得到许可，随时随地可将捉到的土匪就地正法。春暖花开之时，已经没有人对刀枪不入的真实性进行探究，刘士端以及大刀会的成功就足以说明任何问题。当刘士端的影响力渐渐上升到权威的过程中，一切问题都已经不是问题。刘士端更多考虑的已不是横行的土匪和若友若敌的官府，他觉得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另一个乡村势力上来，因为它们也在招生，并且丝毫不给他面子地将他痛恨的土匪作为生源。这个势力就是教会。

*

一千多年前，“上帝”就来到了中国。为此，当时的中国皇帝李世民特意派人接见了景教大师阿罗本，并为其建立了景教寺，臣子魏征还奉命翻译了景教的教科书。

据被魏征翻译留下来的《序听迷诗所经》介绍说，阿罗本的门派叫景教。景教是大秦国（古东罗马帝国）的国教，他们信奉一个天尊，这天尊见众生苦难，便化为凉风吹向一个叫末艳的童女，童女感凉风受孕，生下一子名谓“移鼠”……对基督教略有了解的人可能已经猜出来了：“移鼠”就是“耶稣”，“末艳”是“玛丽亚”，“天尊”则是上帝。

景教几乎伴随了唐朝的始终，为了能使自己在中国生存下来，它主动迎合佛、

道二教，并将上流社会当作“普度”群，但这也成了它消亡的主要原因。随着唐朝的灭亡，景教也退出了中国。

600多年后，蒙古人统治中国，景教借尸还魂，被称为聂教。100多年后，聂教教众遭到铁木耳的屠杀，从此绝迹。同聂教来到中国的欧洲天主教毫无作为，明朝初年又被限制活动。彼时的中国，上帝无法落脚。

万历年间，天主教教士利玛窦与万历皇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明朝政府允许他在广东肇庆也只能在肇庆定居并传教。这使得天主教成功地再次把上帝迎到了中国。但上帝的步伐始终很缓慢，当时传教士最主要的身份是介绍西方文化的使者，而不是单纯的基督徒。清朝雍正年间，新教开始传播。开始，也等于终止。雍正年间，朝廷下令禁教，原因是这些教派攻击中国的儒家思想。

上帝真正落户中国，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战败的大清政府被迫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并享有“治外法权”。让“上帝”最欣慰的是，他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黄皮肤的儿子，耶稣的弟弟洪秀全。据洪“天弟”所言，他老子上帝见哥哥耶稣对人间的人心败坏控制不力，所以又生了自己来解救苍生。

包括最不忠贞的基督徒，都对这个从天而降的上帝的儿子表示了莫大的崇敬。可惜，让一些最蹩脚的基督徒们都感到失望的是，这个“洪老二”并没有推行他们的教义与实现上帝的中国户口问题，并在许多年后被湖南人曾国藩打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也灰飞烟灭。

基督徒们最终发现，想让上帝在中国落户，还要靠自己国家的大炮和他们不畏辛苦的四处奔走。

无论是景教，还是新教，或者是天主教，都归上帝领导。这些教派与佛教、道教所不同的是，具备了咄咄逼人的攻击性。佛教与道教恨不得把自己的老巢安在深山老林里，但上帝领导的宗教却喜欢向人间进攻。每到一地，若是情况允许，他们最先做的事就是建教堂，以保证和证明自己在此地传教的决心。

与新教不同的是，天主教主要在乡村传播，不但传教，还放高利贷和经营商业，并在某些时候，强迫中国教徒捐献钱财与土地。有时候，这种强迫活动也适用于非教徒。在进行这些活动时，传教士必须是强横的，否则他不可能让这些活动顺利进行。于是，就发生了中国民众与教会的冲突，也就是大清历史上所谓的教案。

从1844年第一起教案即浙江定海教案到刘士端成立大刀会止，据不完全统计，发生在中国的教案至少已经有1000起，其中比较大的教案不少于400起。大部分被攻击的教徒都是天主教徒。在外国强大的大炮与不平等条约中“外国教士有传教权并要受到法律保护”的条款下，清政府对频繁发生的教案简直伤透了脑

筋。当年，马圈失火，孔子急忙问“伤人乎？”而不问马。在大清朝，一旦某个地方发生教案，清政府惶恐地问的却是“伤羊（洋）乎？”而不问民。

教会很早以前就来到山东，不过了解中国形势尤其是山东情况的传教士们都知道鲁西南不是个好地方，这里最适合的是占山为王，而不是建教堂。直到1879年，天主教派一个颇有进取心的圣言教会的出现，才让“上帝”来到了鲁西南。圣言会的老巢在德国，当德国传教士安治泰——一个侏儒和喜欢将一句话掰成两半来讲的人——于1883年来到鲁西南时，圣言会就开始了它的进攻步伐。但开展得非常不顺利，安治泰费了吃奶的力气才在一个“穷山恶水”（安治泰注）的地方建立了第一个教堂。好的开始，就等于成功了一半。两年后，圣言会从清政府那里取得了对鲁西南教区的独立管辖权，五年后，又从法国手中夺到了山东的“护教权”。安治泰对天主教教义的信奉程度恐怕要比他的办事能力强得多。到了1896年初，安治泰发展教徒多达16 000人，仅在曹州，每乡就有至少3个教堂，刘士端所在曹县附近的单县更是教堂林立。教堂的数不胜数就证明了多数村民已经成为教民。

从宗教对人的唤醒角度来讲，天主教与中国的儒家、佛教、道教相比并不具备任何优势。它认为，人自己不能拯救自己，只能靠上帝。上帝在今生拯救你，你来生才能享福。孟子却说，人人皆可为尧舜（上帝）。和尚也讲，只需要面壁数年就可成佛作祖。道教就更直接了，吃对了药就能成为神仙。

无疑，天主教对人的吸引力并不大，对于非常实际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它可能会成为空中楼阁。但是，它成功了，使许多人入了教。你在当时的曹州可能找不到10个和尚，但一定能找到100个教民。天主教的成功还是因为中国百姓的现实性。前面讲过，黄河泛滥经常影响鲁西南，特别是在1895年左右，也就是刘士端开始创建大刀会时，大部分本就已经贫瘠的土地因为黄河泛滥更加无法耕种。无法填饱肚子的一部分人抛弃亲娘妻儿去当了山大王，另一部分却领着一家老小全都入了教。因为教会凭借着多年的商业经营和欺诈已经有了可靠的物质保障。这些人之所以入教就是冲着食物来的。教会的优势还不仅限于此，在地方，它从与官府的平起平坐发展到凌驾于官府之上，成为政府中之政府。在一些教士那里，教堂已经不仅仅是传播上帝思想的地方，而是许多愿意到来的中国村民的避难港。无法交纳政府苛捐杂税的人和被官府视为罪犯的人，教堂都可以提供保护。而且，这种保护效果相当明显。

曹县的教堂就很好地保护了土匪岳二米子的许多部下，并使许多无辜的百姓除了交纳必须交的税款之外，无须再跟前来收税的政府官员啰唆。

如果单纯地从教民的角度来讲，教会并非是十恶不赦的组织，它们不但为自己

提供物质条件，还可以在官府那里大声说话，不怕挨青天大老爷的板子。在政府眼中，“干预诉讼”是教士们经常做的丑事之一，他们将朝廷命官本该拥有的权力彻底打碎，“官本位”观念也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如果真有地方官敢攻击教会所包庇的对象，他们就会向北京的本国使馆求援，本国使馆再向总理衙门抗议，总理衙门的斥责命令马上就会到地方官手中。

恐怕没有一位地方官会冒着丢官和掉脑袋的风险继续主持公道。于是，在教会与中国地方官府因为官司而发生的这种频繁交往中，村民们更坚信了教会的无所不能。至少在我看来，地方官对教会应该是又怕又恨的。只是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保住自己的官位，所以只能让自己处在怕的阶段，而不敢采取实际行动来发泄心中的恨。

长期以来，教会给我们的感觉是无恶不作，是隐藏在乡村中的土匪。但在许多传教士的回忆录中，我们却看到另一番景象。有教士说，村民们入教是要冒着很大的名誉风险的，教民被当地人斥为毛子，教民的小孩子被讥讽为鬼子。他们被禁止参加村民举行的一切娱乐活动，并且在路上行走时总会被人恶语相向。讽刺、挖苦、咒骂，是教民们经常受到的待遇。在曹州的圣言会教士口中，我们得知许多白莲教徒为了躲避官府的缉拿也进了教堂。这更为一直就蔑视和恐惧白莲教的村民们提供了攻击教民的理由。

是哪一方先进攻的，我们不得而知。总之，教民们一直跟村民对抗。对抗的结果往往是，村民们只不过赢得了口舌上的胜利，而教民们得到的却是看得见的实惠。因为一旦引起纠纷惊动官府，教士则会出面，政府官员不分谁对谁错，只将胜方的牌子指给教会。

村民必须要找到一个靠山，来跟教民理会。

大刀会的出现无疑是给村民们——无论他们是不是大刀会成员——提供了一个靠山，而这个靠山也及时地显示了它的作用。

*

大刀会与教会的冲突绝不是正邪不两立，而是一山不能容二虎。一山之所以不能容二虎，也并非两只老虎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只是因为老虎下面的狐狸或是狼靠着老虎的威名，不肯跟对方打好关系。小弟受了伤害，做大哥的如果不出面，显然不符道义。于是，一山中的两只老虎自然会碰面，开战就是必然的了。

最先登场的“两只狐狸”是曹县附近成武县的一个药铺商人郝和升(A)和一个教民吕登士(B)。

1897年春节前夕,A去B那里讨要赊欠的药钱。B虽然称不上富有,但那点钱还是可以拿出来的,可他却不想给,结果两人就发生了口角。原本,这是两人恩怨,但A立即上升高度,指着B的鼻子臭骂,并且对其信仰提出质疑。B立即就还口,结果他嘴上功夫不如A,于是,他的亲戚,另一个教民C站出来,帮他骂A。

C是个头脑灵活的人,立即说加入大刀会的A是邪魔外道,并且升级为白莲教余孽。大刀会的确是搞白莲教那一套,比如烧香、拜祖师爷、喝符水,舞弄大刀时还张牙舞爪,但绝对谈不上是妖孽。

A见在信仰上实在骂不过C,就翻他的老底,因为C曾做过土匪,后来为了躲避大刀会的追杀才入了教。所以A骂了一句:羊羔子(当时中国百姓对教会的蔑称)教庇护匪人。

要知道,匪最怕别人讲他是匪,所以他大怒,就想动用武力。但当时看热闹的人很多,被劝阻开了。

C可不是省油的灯,或者说,C一直是想从良,但今天A却揭了他的伤疤,无论如何,这口气他都咽不下去。于是,他去附近的教堂把自己受辱的经过说给教民D听。D听了大怒,立即召集了一伙教徒,准备在第二天去找A算账。

A早已得到消息,就赶紧去找单县的大刀会首领、刘士端名义上的大徒弟曹得礼。曹得礼听说了这事后,拍案而起。在他看来,跟教会早就该打一架了。于是,他召集了附近的大刀会成员,数目要比D的教民多出许多,跟D约定好了地方,要理会理会。

两方人马挑的地方也不怎么样,是一个药铺。双方一见面,开始讲理。要知道,打架的双方见面一旦说起话来,架可能就打不成了。事情果然如此,药铺的老板怕两人殃及池鱼,就劝他们消气。曹得礼是个非常痛快的人,不想伤及无辜,又见A的确没有受到伤害,就带人走了。走之前,他正告D,下次你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D被威胁得愤恨不平,回到教堂后,思量再三,跑到在天宫庙附近主持教会的王教士那里求援,他希望王教士能给他点教民,好让他出出这口恶气。同时,他给曹得礼送信,在约定日期固定地点,重新理会一下。

曹得礼接到信后,便带着A来见刘士端。刘士端听了二人的讲述后,沉默了一会,就答应了曹得礼希望带人前去讲理的请求。刘士端这个时候并不想跟教会结下仇怨,但曹得礼是他的得意弟子,他没有理由不答应曹得礼的请求。

于是,曹得礼带着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到了指定地点,但D并没有出面——D这个时候正被得知此事的一位德国传教士训斥——曹得礼就命令手下砸毁教

堂。大刀会成员还没有砸得尽兴，当地防营的哨官宋清太和寨长就惊慌赶来了，劝阻曹得礼。并且答应曹得礼，会让 D 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与此同时，当地的地方长官也被惊动，县令亲自前来劝慰，曹得礼爽快地答应了这些人的请求，散了。

几日后，两位德国传教士请了宋清太从中调停，郑重宣布大家和好，不再生事。

但安治泰却不干了，他认为大刀会砸毁教堂的行径已经构成了犯罪，要求清政府必须将一干罪犯绳之以法。安治泰办事很周密，在对当地地方官提起抗议的同时，他又电告德国使馆公使海靖，希望他能在北京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海靖还真就跑到了总理衙门，让总理衙门对山东方面训斥，坚决取缔大刀会。

当时的山东巡抚是李秉衡，这位忠于朝廷，却无法拿出良策来对付教案的 60 多岁的老人家只好在山东发布公告禁止大刀会。在他的命令下，曾经奖励过大刀会缉拿土匪，并默许大刀会就地处置土匪的曹州知府毓贤也颁布告示，悬赏捉拿会首头目。

不过，这一法令并没有真正实施，在毓贤的不作为下，刘士端照样于曹县活动，各地的大刀会依旧在光天化日之下走着自己的路。

刘士端等大刀会头目见官府对自己没有动静，胆子立即大了起来。在众人的提议下，刘士端开始展示他亲手创建的大刀会的实力。展示实力的方法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向敌人大规模地开战，由此来获得荣誉；另一种是阅兵。刘士端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1896 年三月初三，曹得礼在单县西四里的火神庙召集会员，为大刀会的祖师真武大帝诞辰举行大集会。

据不完全统计，大刀会这次来了五六千人，盛况空前。有人亲眼见到庙的四周布满了红旗和大刀、红缨枪、钺之类的武器，刘士端穿着戏曲里的龙袍骑在马上，向众人挥手。在他的建议下，火神庙连唱了四天的“对台戏”，当地百姓也纷纷前来观看。

后来的口述材料中提到，刘士端这个时候是想要当皇帝，所以后来才被政府镇压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刘士端的展示实力，轻看政府的因素固然有，可这位出身小地主、并已经结婚生子、四十多岁的曹县汉子不可能去造反。即使曹州有这个风气，也丝毫影响不了他。他创建大刀会的目的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自这次炫耀实力后，曹州的土匪数量明显减少，大刀会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因为目标已基本实现，会员们已经无事可干了。刘士端很可能注意到了这个危险的信号，他面前有三条路可以走：要么造反，要么重新寻找一个敌人，要么将大刀会解散。

刘士端不会走第三条路。人一旦被推到顶峰，正在欣赏风光之时，绝不会轻易下来。他更不会走第一条路。他对大刀会的控制自然心中有数，以师徒关系作为